

2005.1 (总第一百零五辑)



- 要 ● 我与《金瓶梅》研究
● 著名化学家陈茹玉先生事略
● 冯玉祥将军与私立乐仁小学
目 ● 记“白求恩奖章”获得者王擷秀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总第 105 辑. 2005 年第 1 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6
ISBN 7-201-05070-2

I. 天... II. 中... III. 文史资料-天津市 IV. K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505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宏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10.00 元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2005·1(总第105辑)

学人自述

- 李何林自传 李何林(1)
我与《金瓶梅》研究 宁宗一(6)

科学之光

- 著名化学家陈茹玉先生事略 李玉璁(23)
何炳林自述 何炳林(30)
追忆我的父亲李吟秋先生 李靖森(39)
记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高镜莹 张绍祖 张建虹(51)
直隶工业试验所钩沉 王家琦(68)

教育百年

- 天津近代教育事业发展概略 陈隽如(78)

冯玉祥将军与私立乐仁小学	游铁民(84)
回忆我的老师郑菊如先生	刘炎臣(88)
忆母校——河北女师	马翠官 孙淑卿(91)
女师生活片断回忆	张文林(99)
我所知道的圣功女中	郑爱梅(105)

杏林撷英

记“白求恩奖章”获得者王擷秀	王世铎(109)
特殊的家庭背景 特殊的人生	
——记眼科专家倪忠信先生	周桂兰(122)
天津市医务人员到边疆安家落户纪实	王继秋(130)

工商史话

天津商会百年轨迹	宋美云(147)
解放初期天津私营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	刘文智(173)
近代天津企业中的海归企业家	宋美云(183)
宁波“红帮裁缝”在天津	刘文勇(197)

文化长廊

天津近代博物馆概览	涂小元 郭 涌(202)
水西庄与天津儒雅文化	王兆祥(222)
父亲宗基友和他创办的《华北汉英报》	宗瑞林(227)

知青岁月

- 难忘那片神奇的黑土地 张玉茹(232)
葬江花祭 杜鸿林(250)

传奇人物

- 裕容龄——从闺阁走向世界的中国女性 唐培堃(272)
施剑翘的晚年生活 沈伟东(285)

友谊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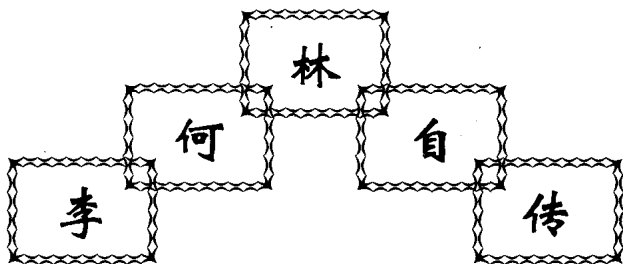
- 天津神户结为友好城市之回顾 耿建华(290)

津沽洋人

- 我所知道的中国戏曲研究专家松浦恒雄 甄光俊(299)
奥地利建筑设计师罗尔夫·盖苓和他的作品 金彭育(302)

采风之旅

- 寻找一个名叫固镇的地方 肖克凡(307)



李何林

我生于1904年1月31日，安徽霍邱县人，曾名李延寿、李振发、李昨非、李竹年，城市贫民出身。因家贫，十岁方入私塾，两年后转入小学。十六岁考入不收学费和膳宿费的安徽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阜阳）。当时的中学不但收膳费，而且收宿费和学费，穷孩子交不起。

在师范学校的4年，正值五四运动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继续发展的时期；出身穷苦的青年比较容易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当时的《新青年》、《新潮》、《北京晨

报》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小说月报》、《少年中国》等，我们都喜欢看。语文课本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四册带注解的《国文读本》，全是古典的散文和诗赋；我们一面听讲，一面偷看这些报刊和新书，接受了当时的科学、民主、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社会民主、剩余价值、无政府主义等等粗浅的影响。

师范结业后，家境稍微好转，又得到亲戚的帮助，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农学院的生物系。勉强读了两年，经济方面

很吃力,遂投笔从戎,于1926年秋到武汉参加了北伐军。先被分配到武昌南湖学兵团编《学兵日报》,1927年春调十一军二十五师政治部做宣传工作。这个军听说从广州北伐时的第四军(铁军)到武汉后扩编的,因屡立战功的叶挺独立团而著名。政治部主任李陶(硕勋)是我党培养的革命干部,上海大学毕业生,四川人,处事沉着冷静,我至今仍怀念他(1980年《星火燎原》丛刊第二辑,有我的《回忆南昌起义前后》,这里只略述)。

到二十五师后不久,就随军二次北伐,开到河南打奉军。我师很快解决了上蔡县的富双英的一个旅(相当于师);二次北伐,以武汉各路军和冯玉祥军会师郑州而告终。我军我师立即凯旋武汉。不久又东下讨蒋,驻军南浔路上;师司令部和政治部设在黄老门车站。就在这个地方,组织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在1927年7月初。不久我师奉命南下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约四五日,大军

即向江西东南部进军。经过抚州、宣黄、广昌、宁都、瑞金、会昌,又折回,东去汀州、上杭,打到广东。失败后,我回到家乡霍邱,找到了党组织,公开职业是城内高等小学校长。1928年夏,参加了回击反动派白色恐怖的暴动;暴动后逃北平,已知被安徽反动政府通缉,遂改名李竹年,避居在鲁迅先生组织领导的未名社,失去党的关系。我和鲁迅先生既不认识,也未通过信,但和该社成员李霁野、韦丛芜是第三师范同学,又是霍邱同乡,思想相通。他们当时被释放不久,冒危险接受我和王青士(烈士,系王冶秋之兄)二人在社里避难,维持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替他们做一些校对、发行和门市部出售书刊的工作,直至1929年夏我去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教书为止,约一年。

在未名社一年期间,正值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时期;这个门市部和上海进步书刊出版社建立了互售书刊的关系,我得以阅读有关革命文学论争的各方面的文章,就在

1929年编了一本《中国文艺论战》，不久又编了一本《鲁迅论》，开始用“李何林”笔名。1930年这两本书在上海北新书局先后出版了。一直到抗战为止，我陆续在焦作学院、太原国民师范、太原师范、济南高中、北平中法大学等校教语文。抗战后逃出北平，回家乡继至武汉、重庆。在各地教书同时，沿途收购有关五四以来文艺思想论证的书刊。1939年春，在四川江津县的白沙镇住下了，用了约一年时间编完了《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于1940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但在西南大后方终于被反动派禁止（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书刊目录》中列有这本书）。

从1940年秋到1942年夏，承老舍先生介绍，我到云南、大理、喜州的华中大学（抗战后从武昌迁来）中文系教书。1942年夏到1946年夏，大约因《思潮论》被禁的原因，没有学校请我教书，我只得改行在友人经办的昆明利滇华工厂做秘书工作，业

余从事文艺活动。我参与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领导工作，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组织，任文艺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编过《云南日报》的文艺周刊和《云南晚报》的杂文副刊。在闻一多、李公朴二同志于1946年7月中旬先后被杀后，我和一些同志不得不离开昆明，辗转上海、南京和家乡，找不到工作，到1946年冬才由李霁野介绍到以鲁迅老友许寿裳为馆长的“台湾省编译馆”世界名著翻译组工作，用英译本翻译俄国十九世纪作家阿卡沙可夫的小说《我的学校生活》。1947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被镇压后，不久编译馆被撤销。许寿裳因友人关系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介绍李霁野和我分别到外文系和中文系任教。许老在鲁迅逝世后发表过多篇歌颂鲁迅的文章，尤其赞扬鲁迅在上海十年的战斗，因此反动派恨之入骨，遂在1948年2月18日夜在睡梦中把他砍死在床上。继闻、李被暗杀后不到两年我又亲眼看

见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卧血泊中。我于4月中只身逃出台湾,5月13日由北平、天津进入华北解放区,这日子我是永远记得的。从这以后我用“李何林”这个名字,不再用“李竹年”。

我到华北解放区时,适逢“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个区的北方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组织上任我为华北大国文系主任。1948年7月我参加了在石家庄召开的华北人民代表会议。北平解放后,我于1949年3月随校迁到北平。7月,参加全国文艺界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文协的候补理事。9月被调任为中央教育部的秘书长兼行政处长。一年后改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兼校内“解放区中学语文教师进修班”主任。解放初期曾和蔡仪、王瑶等同志共同草拟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供新开课的教师参考,自然是极其粗略和不成熟的。1952年秋全国院校大调整,又把我调整到南开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57年

3月在南开大学重新入党。在天津24年间,出版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新文学出版社)、《鲁迅的生平和杂文》、《鲁迅〈野草〉注解》(陕西人民出版社)。曾任天津市作协副主席、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民盟天津市委副主委和民盟中央委员、天津市人民代表、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即被打成“牛鬼蛇神”,1969年4月“解放”。

1975年10月底,周海婴同志上书毛主席建议加强鲁迅著作和手稿的编辑、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毛主席批示“赞同”、“立即实行”。国家文物局呈准中央在所属北京鲁迅博物馆内成立鲁迅研究室。1976年2月调我来京负责这个馆和室的工作,主持编写《鲁迅手稿全集》、《鲁迅年谱》、《鲁迅研究资料》、《鲁迅研究动态》等。四年多来,继续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鲁迅研究学会理事和副会长等(后三者都不需要我做很多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师大中

文系教授,指导研究生。

从1948年5月进入解放区算起,我在新社会生活了35年,在旧社会生活了45年。我从1926年开始工作起已经工作了57年,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大、中学教书。在旧社会,所谓“国立大学”是不请我去教书的,我只能在省立、私立大学任教。无论大学或中学,我只能教一年、一年半,至多两年,由于思想原因就不续聘了。时时有失业和被捕的危险。在旧社会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又何止千万!我常常换学校、换地方,东奔西跑,“四海为家”,除家乡外,北京、天津、焦作、太原、济南、阜阳、武汉、重庆、隆昌、白沙、大理、昆明、台北市等大小城市我

都住过,什么地方有工作(饭碗),就到什么地方,哪像解放后有些大学毕业生,分配时还挑工作地点呢!教书不过两年,怎么可能叫我做系主任呢?全国解放前后,我虽然不是党员,也担任了多年的系主任和其他社会、政治、学术方面的领导职务。我在新旧社会的职务和职称虽然都不算高,但一对比,仍有很大的变化,这样变化的知识分子又何止千万!在建设“四化”的方针指导下,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学术的职能将会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过去的一切遭遇将不会再来了。知识分子将以堂堂的脑力劳动者为祖国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 宇宗一 ~~~~~

—

1950年我从北京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的系主任是由西南联大转来的并以研究《洛阳伽蓝记》闻名的彭仲铎先生。担任古典文学讲授的还有华粹深、孟志荪和朱一玄三位先生，语言文字学的老师是邢公畹、张清常和杨佩铭三位先生，助教只有张怀瑾先生一人。由于当时课程较多，几位老师负担极重，所以采用了“就地取材”的办法，聘了阿英、卢甸二位先生讲授文艺学。方纪虽然担任政府部门工作又从事文学创作，但还是常年给我们讲俄罗斯苏维埃文学。阿垅先生则开了诗歌讲座课。何迟先生在创作相声、改编戏曲之余，应华先生之约给我们讲“人民口头创作”一课。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请了北师大的王瑶先生分别讲授前后两段。诸多名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使我们入学两年学到了很多理论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2年院系调整对南开大学来说不啻为一次“盛大节日”。在我看来，具体到南开中文系，它后来能跻身于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前列，是和开国后的这第一次教育改革分不开的。当时我们迎来了希伯来文学史研究专家朱维之先生，吴梅的大弟子、曲学专

家王玉章先生,原中山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李笠先生,中国文学史和修辞学专家王达津和陈介白先生,还有文艺理论家顾牧丁先生。教育部为了加强南开中文系的领导力量,特别派了李何林先生担任主任。与众多著名专家、教授一道来的是刚刚从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的许政扬先生和清华大学毕业的陈安湖先生。不久以后,又从北京马列学院调来了古汉语专家马汉麟先生。现代汉语专家宋玉珂先生在稍后时候也来南开任教。这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师资阵容,各个学科也为之完善,中文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和朝气。这些良师都曾从各个方面给予我日后的学术道路以重要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院系调整后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师生大会上,李何林先生自我介绍后,又一一介绍了各位新旧中文系教师。而在介绍许政扬和陈安湖先生时,李师特意点明许、陈两位是燕大和清华的高材生,是作为何林师调入南开的一个条件,特请部里分配给我们的。这颇有文字下加着重点的意味,所以同学都有很深的印象。如果说到印象,对我个人来说,可能还和二位青年教师的风度有关。他们不仅来自名牌大学,而且都具有典型的南方学子的文秀儒雅的风采,所谓文质彬彬也。特别是许师的中式对襟蓝布外罩和中分式背头,瘦弱的外形却蕴涵着一股灵秀之气,都令我在直觉上感到,这位孙楷第先生的亲传弟子必定是个俊杰之士。实至名归,许师后来逐步显示的学术研究实绩,完全证实了我的第一次直觉的正确。如果说有什么感应的话,这“第一次印象”,就真的奠定了后来许师作为我的导师的那一段不寻常的缘分。

许政扬先生在历史系为二年级同学讲一个学年的中国文学通史,要从先秦讲到五四前,共108节课。直到1953年第一学期,他才给我们本科生讲文学史中的元曲部分。他总共讲了24节课,四周的课让我们三四个年级的同学充分领略了许师的博学多才和个性魅力。这是一种崭新的感觉:用练习本写就的密密匝匝的讲稿;

讲课时舒缓的语气中具有颇强的节奏感；用词、用字和论析充满了书卷气；逻辑性极强，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枝蔓和影响主要论点的话；板书更极有特色，一色的瘦金体，结构修长，笔姿瘦硬挺拔，竖着写，从右到左，近看远看都是一黑板的漂亮书法。如果说这是“形式”的话，那么他的讲授内容更令我们感到深刻和精辟。比如在讲《西厢记》时，首先是顺向考察，这样我们就把握了王剧创造性改编的关键。而在横向比较中，许师从俄译本直接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话：“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这真是画龙点睛的一笔，使我对《西厢记》爱情和婚姻的意义，有了一种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感觉。今天回忆这一点，我深切地感到许师对理论修养的重视，这对我半个世纪从事学术活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上大学期间，我对自己所崇拜的老师的讲课，一律采用“有闻必录”的方式。缺点是不能及时领会、消化课程内容，并在追踪其观点时展开独立思考；但好处是，有了完整的记录可以慢慢消化老师的授课内容。许师的课，最大特色是，只要你能“跟得上”，记录下来一看，就是一篇完整、绝妙的论文。我的办法虽属笨法之一，但我觉得获益匪浅。五十个春秋，经过了风风雨雨，许师讲的宋元学史元曲部分和选修课“元曲”的笔记，我至今保存完好。为了备课和写作，不时展读，仍然给我很多启发。

一晃到了1954年7月，我毕业了。从性格上考虑，我渴望当个记者，但分配名单下来时，却让我留系任教，而且分到了古典文学教研室，这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我虽无法拒绝当教师，但我怕自己教不了深奥的中国古典文学。我提出的惟一理由是，我的毕业论文是李何林先生指导的《论解放四年来的长篇小说》，所以请求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工作。当时担任系助理的朱一玄先生找我谈话，第一条当然是要服从组织的安排；第二条是跟许先生学，并担

起历史系的文学史教课任务,以便尽快请许师回本系任教。“跟着许先生学”,一锤定音。许先生是我的导师,使我安下了心,并于当天下午拜见许师。

许师仔细听了我的自我介绍,沉吟片刻后说:“我先给你开个书单,你从现在起就边讲课边读这些书。”两三天后我就收到了许师给我的一篇三十本书目单。这是一个既简明而又沉重的书目,从朱熹的《诗集传》,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的《楚辞》,一直到龚自珍的诗。三十部书中除我读过的几部章回小说外,竟还包括我望而生畏的《昭明文选》、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以及仇注杜诗、王注李诗。许师看我而有难色,于是作了如下说明:(1)这些书要一页一页地翻,一篇一篇地读,但可以“不求甚解”; (2)这些注本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注文要读,目的是“滚雪球”,你可以了解更多的书,包括已散佚的文献; (3)把有心得的意见不妨扼要地记下几条,备查。一纸书目,三点意见,对我一生教学治学真是受用无穷。说实话,我就凭着这三十本书的基础,逐步拓宽阅读范围,教了三年历史系的文学通史和三年外文系的古典文学名著选讲,应当说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纰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步步明辨出许师的一片苦心:第一,我的国学底太薄,必须先打基础;第二,让我硬着头皮苦读几部较大部头的原著,而不让我先看各种流行的选本,目的就是为了让避免某名牌大学出来的毕业生竟不知“古诗十九首”出于何书、乐府诗又是怎样分类的尴尬!

在这里我还要重重地提一笔,50年代的南开中文系由李何林先生定了一个规矩,青年助教上课前必先在教研室试讲,正式上课时,导师要进行抽查。我在给历史系讲文学史课时,李师共听了三次课,而许师竟随堂听了六周课。李师对我授课多从技术上和仪表上提出意见,比如我的板书写得太草,写完挡住了学生视线以及说话尾音太轻,后面学生听不清楚,以及中山服要系好风纪扣和皮鞋要擦干净等等。许师对我的讲课的意见多着眼于疏解的准确

性、分析阐释的科学性等等。当然,对我读错的字,也一一指出,这些就是所谓匡正悖谬、补苴罅漏。而我也要在下一次上课开始时,就向同学正式纠正自己讲错了的地方。这种从青年教师的严格要求开始,不仅奠定了南开中文系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教学规范,而且对我大半辈子从事教学工作以及认真负责的课徒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一边在给同学上课,一边听许师为五四级同学讲专题课“元曲”。应该说,我是一个好学生,不缺一节课,同样像学生时代一样做了完整的听课笔记。二十几年后我成了硕士生导师,在讲元曲诸课时能得到些许好评,其实都是许师原先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但是,如从讲学艺术来说,我太缺乏的是许师的那种娓娓道来的风度和使聆听者强烈感受到的一丝丝飘逸的气息。我虽时时刻刻也想克服我讲学时的那种匠气、呆板和矫情,但却难以做到像许师那样对博大的艺术世界的向往和追求。我想,这可能就是素质、学养和文化底蕴的差异所造成的距离吧!

如果说,此前我还是跟着许师学习如何从事教学工作的话,那么从1956年,也就是许师校注《古今小说》开始,我就正式进入了向许师学习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新历程了。

约在1955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系统整理出版了中国优秀的古典小说,在“四大小说经典”出版的同时,重点抓了“三言”的整理工作。

结果是冯梦龙选编的第一部也是最精彩的一部“古今小说一刻”(即《喻世明言》)就委托给了许政扬先生。那时许师30岁。

小说研究行家多清楚,“三言”如中国众多小说名著一样,由于版本不同,刊刻不精,文字上多有歧异和论误。许师在考订版本源流的基础上,选择善本、足本为底本,以有价值的参校本比勘对校。他倾其心血,发挥其学识之优长,在训诂、校勘中,真正做到了精勤与博洽的统一,且细密与敏锐相得益彰。而细琐与难考之事,



亦以求实之精神,不妄下一语。另外,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许师常于校注中开掘前人未发之意,修正前人的某些谬误,此锲而不舍的探寻文本真詮之精神,对我大半生的治学态度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经常结合《古今小说》的校注工作给我讲解长期被误解的词语。比如,把“行院”解作妓院,就是历来注家的误解。许师征引大量资料,说明“行院”乃是同业的一种组织,各行皆有,艺人中自然也有走江湖的艺人,到一个地方演出,就有当地的“行院”,帮助他们安排演出或居住的地方和用具。于是许师引用车若水的《脚气集》的记载推而论之,凡伎艺人等所谓的“行院”,主要就是这个意思。许师进而论证,用“团体会社”的名称来称团体会社中的人,乃是元明之间常见的一种语言习惯。在这个意义上,把“行院”中人即妓女也称之为“行院”,这才成了最有说服力的、最完善的、最正确的解释。再比如,通常在古典小说、戏曲中,往往把“一颺人马”误印为“一彪人马”。从此以后,就以讹传讹。许师对我讲,宋元时代仅有“一颺人马”而无“一彪人马”,他说,“颺”字字书不载,或以为是“彪”的形误,其实并非。他征引《谢金吾诗酒红梨花》第四折音释“颺”音“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一颺”条:“虏中谓一聚马为颺,或三百匹,或五百匹。”可见,“一颺就是一大队的意思,原系北方方言。许师这种如谈家常、平等对话的态度,不仅体现了学者的风度,对我更为重要的是他用循循善诱的方式,把一个治学粗疏的我逐步引导到追求严谨的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所谓“得窥其门径”应当说是从此时开始的。

值得一提而至今仍令我感到温馨的是,许师总是在两个星期中挑一个闲暇的日子带我到天祥市场去淘书。1955年左右,那儿是一个极大的图书市场,以旧书为主,而《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的各类小册子,堆成了山,三五分钱可以买到一本很有用的书,花上四五毛钱就可以买到《李太白集》。这时许师总要提醒我买些什么书,比如《事物纪原》、《古今事物考》、《释常谈》、《续释